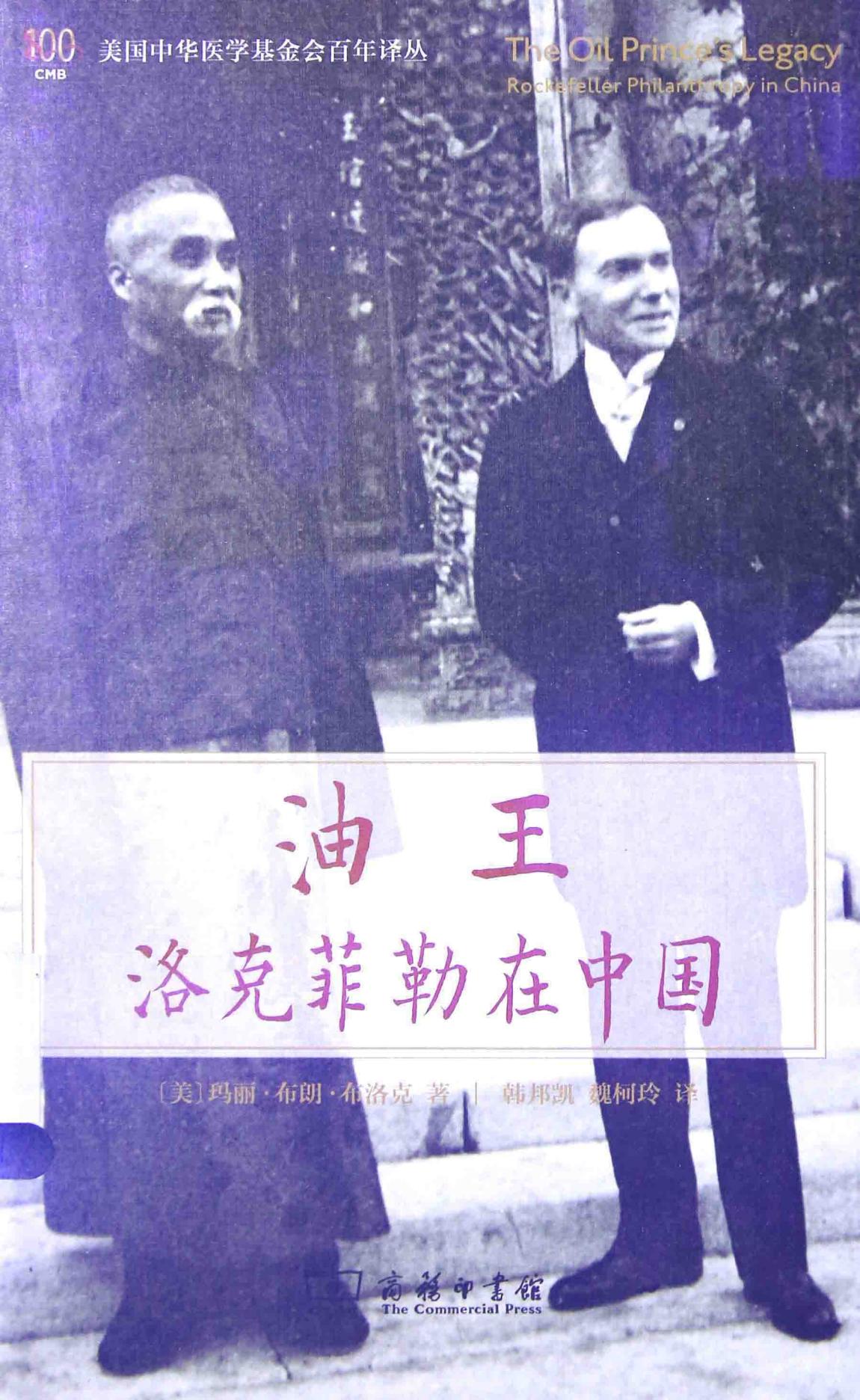


100  
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 油王 洛克菲勒在中国

[美]玛丽·布朗·布洛克 著 | 韩邦凯 魏柯玲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

[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 著

韩邦凯 魏柯玲 译



商务印书馆

创于 1897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 / (美) 布洛克著；韩邦凯，  
魏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0482 - 1

I. ①油… II. ①布… ②韩… ③魏… III. ①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 IV. ①K203 ②K7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66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

[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 著  
韩邦凯 魏柯玲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482 - 1

---

2014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42.00 元

# 献给我的父母

G. 汤普森·布朗和马蒂亚·霍珀·布朗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By Mary Brown Bullock

@ 2011 Mary Brown Bullock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译出。

内文图片版权均属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

# 从书总序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过去经常发生的灾难性的疾病也得到了良好控制。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应得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及有关机构也在这百年中逐步成长起来。在此科学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杰出代表即是有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会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也将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未来发展。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1914 年成立，到 2014 年，即有百年历史。从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CMB 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极其辉煌的医疗卫生史。值此庆祝一百周年之际，CMB 组织翻译了四本经典英文著作，回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 CMB 合作的历史，以飨中国读者。这一套丛书通过对历史人物、机构及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中国在发展现代医学过程中的成就及其相关的争论。其中有三本书集中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本书则重点讲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开拓作用。

为了向中国读者呈现这段历史，CMB 访问了很多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机构的领导者。最终，CMB 的顾问委员会决定由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和达尔文·斯泰普尔顿等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为这些书辛苦作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四本专著。感谢刘德培教授专门为丛书题字。

还要感谢参与翻译丛书的特别顾问达尔文·斯泰普尔顿、梁其姿、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张力军、张霞、蒋育红；译者韩邦凯、魏柯玲、闫海英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等；CMB 的工作人员张烨、李曼玉、阮志贞等。

董事会主席 玛丽·布朗·布洛克

*Mary Brown Bullock*

主席 陈致和

*Leinish C. Chen*

2013年7月11日

## 中文版序

往事如烟，但历史并不如烟。《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一书，讲述了一个美国家族与中国交往的百年历史。今天，位于北京东单的协和医院老楼依然保留着红柱青瓦，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则以比一百多年前更大的规模融进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事业。

历史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人出自于对生活、对知识好奇的本能，会不断发问：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历史包含着无数的生命之谜。

20世纪初的美国和中国，从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等诸多方面来看，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两个国家的内部，都有改变自己的强大动力。但不同点在于，美国的国内力量，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有着极其强烈的改变世界的冲动。而中国从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全身心投入的是争取摆脱被西方列强控制的被动局面，一心希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地平线的尽头，是西方的发达诸国。

这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国故事开始并发展的一个历史铺陈。这个铺陈，着力很大。几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一路交织并行、呼啸前进，不仅贯穿整个20世纪，也许今后还要伴随太平洋两岸好几代人。

从洛克菲勒为代表的美国力量来看，它既是一个家族，更是一种

工业文明的标志。洛克菲勒靠石油起家，用现在的说法，是搞能源的，这给整个家族事业设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属性。

首先就是洛克菲勒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这里先不说石油工业本身了，就以 1913 年正式在纽约注册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一开始的宗旨就定位为“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陈义之高，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宣言。

第二是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初期致力于医学教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优先发展医学教育研究。如 1917 年在中国兴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在海外的最大投资。这些跨文化且力度极大的工作，需要有强大的团队以及团队的领导人。他们必须敬业，必须具备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不是对上而是对整个事业负责，在践行中追求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美。因为只有这种完美才会体现生命的创造力和灵动，才会有被后人欣赏和传承的可能。

第三个属性不容易把握，但是从本书的叙述来看，洛克菲勒家族在开拓基金会的事业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把握了文化因素，尤其是异质文化因素。在遍布美国各地的公共博物馆中，有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其中不少是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早年收藏。在本土收藏外国艺术固然不易，在国外践行文化包容也许更难。书中呈现的一个细节是，1919 年，时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的文森特到中国实地考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筹备，从课程设计、人员招聘到建筑结构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还和当时在北京具体工作的顾临等人一起审查了协和房檐颜色的种种方案。他们最后决定，把屋檐镶板漆成红色，而圆木梁则为绿色。这种大红大绿的搭配，是相当典型的中国色彩。入乡随俗，这一批美国人做到了。他们以这种精致和细心的方式表示了一种文化尊重。这种尊重又使他们成功。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及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江昭（Akira Ireye）的“文化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听上

去虚无，但是实践已经储备了许许多多的有趣案例，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不妨将目光移至 1919 年时几乎同时发生在北京的故事。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请了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设计燕大校园。他们决定，要展现红墙绿瓦、飞檐雕梁、湖光塔影等中国元素。对此司徒雷登有一个说明：“一个传授高等文化的学院，应该使学生亲身体会自己数千年文化的崇高、自豪和祖国艺术的优美。”

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公益活动，是有自身特点的。“philanthropy”一词，现被翻译为“仁慈”、“慈善”，但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等还是有着语境上、文化上的区别。“philanthropy”不是赈灾，不是施舍，不是短期行为。从志向来说，它是要唤起自身和公众的良知，要建立有效可行的机制，要提升整个社会。它带有上面所陈述的几个属性。可以看到，美国人就像是跑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地在跑，在实践“philanthropy”这一理想。在这个跑道上，昔有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今有比尔·盖茨以及许多献身于这个事业的人。他们的着力点，在健康、教育等这些很基础，但是也能够凝聚人心的领域。

本书作者玛丽·布洛克博士，是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从 1970 年代以来致力于推动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知识女性。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不久，她就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代表的身份常驻中国，见到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和许多中国科技、教育、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功底，加上几十年与中国交往的亲身经历，使她有了足够的力量来书写一段中美人文交流中的特殊历史。她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名人，但是她从内心保持着对他们的尊敬。我记得在 2001 年左右，她去看望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后来很动情地对我说，这位朋友使她自己“变得美好”。能够把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视为“让自己美好”的人，使我尊敬。

历史是一条长河。在长河里出生，又终究被长河裹挟而去的是无数的生命。由此想开去，特别是牵涉到本书的主题，从一个美国家族和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联系起来，似乎要破解的生命密码还很多很多。玛丽·布洛克博士这本书，仅仅是开启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袁 明

2013年5月于北京大学

## 序言及致谢

本书既反映了我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参与中美文化关系的经历，也反映了我长期关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中国的历史的学术兴趣。从 1977 年到 1988 年，我担任由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及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组成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主任，我还从 1981 年起担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the China Medical Board）董事。与这两个组织的关系给了我大量机会，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里中美两国在科学和医学方面重新开始的新的互动。我深深懂得了现代科学和医学机构的性质以及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正是洛克菲勒国际战略的导向。这些经历引发的许多问题和争议都在本书中有所涉及。我很感激我的同事，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与我分享他们的亚洲之旅和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不过本书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与任何我工作过的或者有过关联的组织无关。

我的第一本书《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年），专注于 1951 年前的历史，而且大部分写于我访问中国之前，也是洛克菲勒档案全部公开之前。三十年前很少有文章关注中华民国与共产党的中国存在哪些关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持

续进行，就更少有人认为之前在中国的美国文化能传承下去。思考 1970 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也有所怀疑<sup>xii</sup>，特别是基金会对精英科学医学的专注。不过，本书的写作是在我 1974 年以来年年访问中国之后，同时得益于研究穿越整个 20 世纪“长时段”的机构和思想的许多成果，这让我的观点也变得温和。这第二项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更新和改进早期的记录，包括 1951 年以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众多毕业生、教职员多年来对我的款待，和我分享他们对学院的种种回忆。他们的名字列在附录 B 里。但我在此还必须感谢我所见过的五位院长：黄家驷、吴阶平、顾方舟、巴德年和刘德培（他们的照片在第四章）。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他们的每届任期内北京协和医学院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另外，王安有和蒋育红帮我安排了 2007 年和 2008 年的访谈，张霞帮助我使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档案。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将北京协和医学院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即跨越整个 20 世纪的多学科、多机构的洛克菲勒中国慈善事业。这样一项综合性研究只有在最近几十年，许多论述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和美国的科学及医学在中国的专著和论文面世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些丰富的资源均收录在书后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里。我大量查阅了中国的历史档案和在纽约斯利皮·霍洛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资料，因此能够获得这些文献。我和许多其他人都要深深感谢汤姆·罗森鲍姆，他的档案知识和探索精神使我能够有效地查找资料。我还得到了敏迪·戈登和米歇尔·希尔齐克的大力帮助。

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记录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及其与中国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在中国的日记和信件的发现让我开阔了眼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个人介入中国的深度。亚洲协会前主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董事罗伯特·奥克斯纳姆极力劝我“追踪艺术”，结果引出了第二个发现：洛克菲勒家族的女掌门人阿比·洛克菲勒对亚洲艺术与文化的极大兴趣。辛西娅·奥尔特曼是家族府邸

基魁特的管家，她带我欣赏了家族的中国收藏品。戴维·洛克菲勒与我分享了对母亲阿比的回忆，还带我参观了阿比在缅因州西尔·哈伯的中国花园。洛克菲勒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与我慷慨分享了他们的回忆。彼得·约翰逊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家庭传记作家和顾问，我的许多问题和请求都得到了他快速的回应。

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持续慈善事业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亚洲协会、亚洲文化研究院。在每个机构，无论高级职员还是与中国有关的一般员工，都不吝时间与我分享了他们的资料。我也在注释里对他们表示了感谢。 xiii

2006年秋，作为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的公共政策学者，我开始了本书的研究。从此我拥有了安静的时间、出色的同事和非凡的研究助手。2007年，我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贝拉吉欧会议中心（Bellagio Conference Center）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早期版本的第一章还因此得到了我在贝拉吉欧同事们的意見。2008年5月，在哈佛大学关于亚洲跨国公共卫生历史的会议上，对本书第二章的讨论也让我受益匪浅。2009年6月，在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一次关于洛克菲勒在中国的医学的研讨会上，我讲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许多同事鼓励和帮助了我。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出版社主任乔·布林利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非常有兴趣。我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员工的支持。华伦·科恩、约翰·伊斯雷尔、周海成（Zhou Haicheng, 音译）和李常生（Li Changsheng, 音译）阅读了全部手稿，林肯·陈、劳伦斯·史奈德、汤姆·罗森鲍姆和黄建始阅读了部分章节。苏珊·拉比那和伊丽莎白·加洛为我早期的课题计划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对每位读者提出的重要的问题都尽力做出了回答。在我多年的学术行政生涯中，实习生们让我保持着研究的活力：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李兆（Li Zhao, 音译）和丹尼尔·罗森；阿格尼斯·斯各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的卡蒂·罗森鲍姆；爱默瑞大学的董华烨（Huaye Dong, 音译），艾丽·唐（Ellie Tang, 音译）和周海成。杨继灵（Jiling Yang, 音译）帮助我从克利佛兰的报纸中寻找资料。在我担

任校长期间，阿格尼斯·斯各特学院的董事会鼓励并资助了我的中国研究之旅，爱默瑞大学则提供了研究和翻译的支持。

从一开始，我的家庭就一直密切参加到这个项目中来。我十分感谢我的丈夫乔治的兴趣和难得的耐心。格雷厄姆和阿西利提供编辑、技术和方法上的帮助。他们三个都陪我到协和访问，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大量意见。我的父母 G. 汤普森·布朗和玛蒂亚·霍珀·布朗分别出生于中国和韩国，在我还是小姑娘时就带我到韩国和日本生活，他们自己正是本书主要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传教士。他们俩对亚洲的热爱和对美亚文化关系的终身兴趣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

<b>丛书总序 玛丽·布朗·布洛克 陈致和 /i</b>
<b>中文版序 袁明 /iii</b>
<b>序言及致谢 /vii</b>
<b>前言 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慈善世纪 / 1</b>
<b>一、起源：医学、艺术和石油 / 8</b>
<b>二、历程：“科学的传教士” / 47</b>
<b>三、政治：遭遇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 82</b>
<b>四、存续：北京协和医学院 / 121</b>
<b>五、再生：洛克菲勒慈善在新时代的中国 / 151</b>
<b>六、遗产：纪念日 / 188</b>
<b>附录 / 211</b>
<b>注释 / 214</b>
<b>参考书目 / 242</b>
<b>索引 / 252</b>

# 前言 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慈善世纪

洛克菲勒这个名字不常与中国相连——或许与亚洲艺术和日本有关，但不是和中国。然而，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主要外国受惠者，标准石油则是在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前三位洛克菲勒参与中国事业的时间从美国内战一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年代。今天，多个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继续着开始于一个世纪前的在中国科学、医学及艺术领域的种种项目。整个 20 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接近 8 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美国来源。<sup>1</sup>

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映照出一个半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洛克菲勒家族对商业、宗教、科学及艺术的兴趣也概括了塑造中美关系的多维度的非政府力量。

一个世纪前，美国科学家希望向欧洲寻求训练和灵感。很少有人想象过这样一个时代，与中国的科学协作成为第一重要事务，或美国教育出来的中国人有一天会在一些领域主导中国的科学精英。今天，中美之间深远的智力联系正在变得与美英在 18、19 世纪初的教育联系或者美德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科学联系同等重要。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是什么力量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20 世纪超级大国的知识界近身遭遇？展望前方，中国的大国崛起又会如何改变她与